

## 序章

# 毛澤東照片之謎

政府刊行公報，是公佈法律、政令等的程序之一，所以，任何國家的政府公報都十分枯燥，讀來味如嚼蠟。反而言之，公報的內容、語言不可帶有絲毫詼諧幽默，否則就是輕慢。然而，在如此嚴肅的政府公報上，偶爾也能看到莫名其妙、奇怪詭譎的消息。戰前日本政府公報附錄刊登的「毛澤東」照片，就是其中一例。

戰前的日本政府公報曾有副刊(附錄)，稱《週報》，每週出版一次。1937年8月的《週報》載有一張照片(圖1)，註明其為「中華蘇維埃人民政府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」。

這就是毛澤東？分明是個闊佬，或者某家公司的老闆嘛。不會是哪個一貫中規中矩的書呆子開了個笨拙的玩笑吧？

載於《週報》第44期(8月18日)的這張照片，是一篇文章的插圖；該文報道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軍隊的最新動向，標題為〈談支那共產軍〉(〈支那共產軍を語る〉)，作者是「外務省情報部」。既然出自外務省，顯然不是開玩笑。「情報部」之名，讓人不由得聯想到專門刺探、收集外國機密情報的間諜組織，但外務省1921年設立的這個機構，當時主要進行對內和對外宣傳，並非間諜組織。不過，既然要對外宣傳日本的外交形象、對內介紹國際動向，責任所在，收集外國情報自然也不遺餘力。

當時，一個月前發生在盧溝橋的衝突已經演變為被冠以「事變」之名的戰爭，戰火已延燒到上海，並且越來越呈現出全面戰爭的趨勢。在局勢如此緊張的時候，負責準確把握和分析外國情報、國際局勢的日本政府外務省屬下的宣傳機構，竟然在政府刊物發表文章，指稱貌似鬍佬的人是「毛澤東」。戰前的日本曾自詡對中國研究精透、世界第一，甚至比中國人還明白中國事，但卻如此令人大跌眼鏡。假如照片登在消遣性的三流雜誌上，或許還可以說是失誤，是開玩笑；但載體雖然稱為「附錄」，卻無疑是政府公報，其後果自然不同。放在現在，不僅會被媒體冷嘲熱諷，笑掉大牙，國民也會群起而攻之：專門收集外國情報的專家，竟然如此草率！

然而，當時日本人幾乎都不知道毛澤東的容貌是怎樣的，所以沒有人覺得這張照片上胖乎乎的「毛澤東」有什麼不妥。我們現在看到這張照片之所以能笑出來，完全是因為毛澤東後來成了中國革命聞名於世的偉大領袖，他的照片、畫像也隨處可見。也就是說，我們不過是作為後人在嘲笑前人而已。

實際上，在當時，許多中國人也不知道毛澤東是何許人，對中國共產黨（下文或略稱「中共」、「共產黨」），絕大多數人也接觸不到真實信息。因為，當時的國民黨政權（南京國民政府）把共產黨視作眼中釘，不僅加以嚴酷鎮壓，而且嚴密封鎖對共產黨的報道和介紹。共產黨被罵作「共匪」、「赤匪」，亦即十惡不赦的土匪集團；毛澤東也被稱作「匪首」。有人據此判斷他是土匪頭目，但他做過什麼、長什麼模樣，都無從知曉。

共產黨領導的部隊（即紅軍）的最高指揮官、毛澤東的盟友，是大名鼎鼎的朱德。「朱毛」原是二人姓氏的合稱，但卻被傳為某個義匪的名字，甚至被用來代稱紅軍。可是，人們對朱德也是一頭霧水。〈談支那共產軍〉一文也附有朱德的照片（圖2），與1937年時朱德本人的照片（圖3）比較可知，二者明顯不同。《週報》的照片是否朱德，下文將作分析；但觀其相貌，該照片的主人似乎強悍



圖 2 《週報》載朱德照片



圖 3 1937 年的朱德



圖 4 在陝北採訪時的斯諾

而又兇狠，儼然弗蘭肯斯坦造出的怪物。

如上所述，我們在《週報》上看到毛澤東、朱德的照片，馬上就知道不是他們本人而覺得可笑，是因為毛、朱後來逐漸為世人所知，並且贏得了政權。眾所周知，他們所領導的共產黨，在「七七事變」後與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攜手合作，打贏了抗日戰爭，而後又在與國民黨的內戰中取得勝利，建立了中華

人民共和國；毛澤東的畫像至今仍懸掛在北京的天安門上。那麼，是誰最早向世界介紹了毛澤東的生平和容貌？是誰拍了他的照片並將其傳播到全世界？無需贅言，那就是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（Edgar Snow，1905–1972，圖4）和他的著作《紅星照耀中國》（*Red Star Over China*, 1937 & 1938）。

1936年夏，為採訪籠罩在迷霧中的共產黨及其領導人，斯諾從西安出發，進入了「紅色中國」，即陝西省北部的革命根據地。他幸運地獲准採訪三個月，其間為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拍攝了許多照片，並當面聆聽毛澤東講述他自己半生的經歷。這次採訪的成果，包括毛澤東自述生平在內，於1937年秋在英國、翌年初在美國出版後，立刻成為暢銷書。這就是《紅星照耀中國》（下文略作《紅星》）。這部傑出的採訪報告，第一次向世人展現了共產黨領導人的形象，轉述了毛澤東的自述和「長征」故事、共產黨根據地人們的生活現狀，出版後即為全世界讀者帶來了強烈震撼。

現在，中國自不必說，世界各國已出版的毛澤東傳記不勝枚

舉。其中不乏細緻準確的研究，也有瞎編亂造者，可謂良莠不齊、泥沙俱下。但是，無論對毛澤東稱讚還是誹謗，有關他出生和成長的記述，無不來自斯諾的《紅星》。因立場不同，有的作者對記述加以擴展、發揮，有的則不惜肆意歪曲，此類衍生本在不斷引用、傳播的過程中，又難免被添油加醋；但細心觀察可知，其源頭都是《紅星》。因為，在接受斯諾採訪後，毛澤東再也沒有向其他人完整講述過他的經歷。1939年5月，毛澤東曾對蕭三「翻古」，即談起往事。蕭三肯定作過記錄，其中一部分或許寫進他後來執筆的毛澤東傳。<sup>1</sup>不過，毛斷斷續續的回憶，蕭三卻從未公開發表，這點與斯諾不同。唯一收錄毛澤東口述自傳的是《紅星》，這也是該書的可貴之處。

斯諾在採訪中為毛澤東拍攝的照片，發表後也震驚了全世界，成為傳世之作。現在，毛澤東最為全世界熟知的形象，無疑是掛在天安門上的那幅畫像；<sup>2</sup>但那是他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後的畫像，最早問世的則是圖5、圖6所示兩張照片，都是斯諾在陝北根據地採訪時拍攝的。

尤其是頭戴八角帽的一張（圖6），面容消瘦、精明強幹，作為毛澤東年輕時期的照片，現在仍經常被印製在各種紀念品如護身符、貼紙上，中國人應該都看到過。也就是說，我們之所以對年輕的毛澤東有印象，都是拜斯諾採訪陝北所賜。

<sup>1</sup> 王政明：《蕭三傳》（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，1996），頁282-289。蕭三曾作記錄一事，見於其回憶錄〈窯洞城——獻給黨的六十週年誕辰〉，《時代的報告》，1981年第2期。另，蕭三因撰有《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》等毛澤東傳記而聞名；他與毛澤東是老相識，毛澤東對他講述自己的生平，並不奇怪。

<sup>2</sup> 關於懸掛在天安門上的毛澤東肖像，較為重要的國外研究論著有Wu Hung（巫鴻），*Remaking Beijing: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*（《重建北京：天安門廣場和一個政治空間的創造》）（Chicago: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5）。

本書將要介紹的，是毛澤東在《紅星》刊行前尚不為世人所熟知的時期，人們對其印象及生平的描述，以及這些描述等因《紅星》出版而被徹底顛覆的過程。

當然，毛澤東本人在《紅星》出版前後並沒有什麼改變。但《紅星》的出版，無疑徹底改變了外界對他的觀感，就好像時代寵兒一覺醒來突然名揚天下。然而，在斯諾介紹毛澤東以前，人們如何認識毛澤東卻鮮為人知，也沒有相關研究加以探討。

當然，現在要為毛澤東作傳，已經具備條件，諸如他曾經在何時、何地做了什麼，都已經有十分詳盡的文獻可查。比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《毛澤東年譜》，僅斯諾赴陝北採訪的1936年（毛時年43歲）夏以前，就有長達550頁的記述，可謂事無巨細，極盡周詳。根據該年譜記述，我們不僅可以知道他23歲（1916）那年曾向朋友借閱過雜誌，而且還可查到他朋友的姓名（蕭子升，即蕭瑜）、雜誌名稱（《甲寅》）、期號（第11、12期）、借閱日期（2月19日）等；求學時回家省親的日期也一清二楚。<sup>3</sup>到底是中國！到底是中國的毛澤東研究！精細如此，令人嘆為觀止。但是，在毛澤東被視作偉大革命家以前，他曾如何被報導，有過怎樣的傳記、肖像等，該年譜卻幾乎沒有提及。

當然，如1917年日本政府公報曾刊載莫名其妙的毛澤東照片等，此類瑣事就更不在該年譜視野之內了。

本書前半部分將依據當時的大量出版物、肖像資料等，探討毛澤東是如何從迷霧中走進世人視野的；借用名著《紅星》的書名來說，就是他在人們印象中是如何成為冉冉升起的「紅星」的。這些出版物等所呈現的毛澤東，恐怕連中國的讀者和學者——甚至毛澤東本人——也見所未見、聞所未聞。實際上，本書之所以取

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：《毛澤東年譜（1893—1949）》（中央文獻出版社，2013），修訂本，上卷，頁22—23。



圖 5 斯諾拍攝的毛澤東



圖 6 斯諾拍攝的毛澤東

名《「紅星」是怎樣升起的》，乃是致敬中國史學家高華教授的代表作《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》。高教授是毛澤東研究的前沿學者，深受學界尊重，卻於2011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之日辭世，享年僅57歲。該著聚焦1940年上半年的延安整風，描述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取得絕對領袖地位的過程；而高教授將毛澤東稱作「紅太陽」，自然是因為毛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歌頌為「紅太陽」。

對本書作者而言，斯諾和高華都是令人仰止的巍峨高山，對他們深懷崇敬之情；因此，模仿他們的名著為本書取名，未免有狐假虎威之感，不無惶恐。就算是對他們的致敬和紀念吧，還請讀者原諒。假如本書能夠發掘連他們也未必了解的毛澤東的早年傳記，呈現其所反映的毛澤東形象，並描述其如何形成、改變和傳播（或未能傳播），則熟知毛澤東的斯諾和高華，甚至毛澤東本人或許也不會責備本書作者，甚至可能會說「當時怎麼還有這事啊！」

最重要的是，明確當年人們如何認識毛澤東，以及這種認識的形成和傳播過程，能夠使我們重新認識如下史實，即我們現在知道的有關毛澤東（乃至其他歷史人物）的各種信息、知識和形象，準確也好，扭曲甚或錯誤也罷，都是歷史演變的產物。所謂歷史演變的產物，意味着是在過去某一歷史階段，依據該時代的特殊認識（或誤解），經過加工、整理甚至改造、竄改而成。本書假如能使讀者重新認識到毛澤東形象形成的歷史特性，則作者將比得到斯諾、高華的讚許還要高興。

這些信息、形象的形成和傳播大抵有兩種情形。①其本人或所屬團體（如毛澤東所屬的中國共產黨）出於某種戰略而發佈和傳播；②其他人或其他團體為滿足某種需要而收集和傳播。就毛澤東而言，有關①的研究已有很多。比如，對建國後產生的歌頌、宣傳毛澤東的美術作品等，不少學者曾就其創作過程、影響及評價、形象塑造策略等進行解讀；其中僅關於肖像，就有安雅蘭（Julia F. Andrews）、梅嘉樂（Barbara Mittler）、Yan Geng、楊昊成、



胡國勝、牧陽一等運用跨文化研究等手法做過各種各樣的闡釋。<sup>4</sup> 此類研究之所以呈一時之盛有其背景，即改革開放後，曾經風靡國內外的各種宣傳藝術作品受懷舊者、收藏家追逐而流入市場，因而比較容易收集。

與①相比，②的研究卻相當落後。外部世界或敵對勢力對毛澤東抱有怎樣的印象或散佈過怎樣的形象？對此較少探究。此類研究的對象，國內為1949年以前中共以外的勢力——國民黨或民間媒體等——如何報道、宣傳毛澤東，國外則是各國媒體如何報道毛澤東，以及各國情報機構獲取、掌握的毛澤東（及中共）的信息是否準確等等。①的研究儘管也會附帶提及②，但分析對象的選擇（哪國曾流傳怎樣的形象）卻難免隨意，且範圍有限。因為，要對不同國家、不同語言的相關情況作全面探究和闡述，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。

在②的研究中，對毛澤東早期形象的探討又尤其不容易，而其原因與①略有相似：國民黨政府時期，有關中共的信息、報道被置於嚴格管制之下，國內不許流傳的特殊信息，在國外也同樣難以獲取，人們因此對早期毛澤東很難產生清晰的印象。而這也是斯諾筆下的毛澤東在《紅星》出版後迅速流傳、定格的主要原因。

---

4 英文世界有 Julia F. Andrews, *Painters and Politics in the People's Republic of China, 1949–1979* (Berkeley: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94); Barbara Mittler, *A Continuous Revolution: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* (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12); Yan Geng, *Mao's Images: Artists and China's 1949 Transition* (J.B. Metzler, 2018); 中文世界有楊昊成：《毛澤東圖像研究》（香港：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，2009）、陳廣彪和溫晉根編著：《中國宣傳畫史話》（貴州人民出版社，2012）、胡國勝：〈革命與象徵：毛澤東形象的傳播與影響（1937–1949）〉，《黨史研究與教學》，2013年第6期。日語世界有牧陽一等：《中國のプロパガンダ芸術——毛沢東様式に見る革命の記憶》（岩波書店，2000）。